

1104
内部刊物
注意保存

嘉興市文史資料通訊

第十二期

(总 1 2 期)

嘉兴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目 次

嘉兴起义始末

胡亚力(岳宣)

四十年故地叙旧

刘冬生

——记贾亦斌同志重访嘉兴

嘉 兴 起 义 始 末

胡亚力（岳宣）

1948年，蒋家王朝面临土崩瓦解之势，为作垂死挣扎，便在嘉兴、重庆、汉中三处各成立一个预备干部总队，总称国防部预备干部训练团。以第一期复员青年为对象，培训排连骨干，企图组织三十个新军，成立第二线兵团，以阻解放大军的渡江。主持此一行动计划的指挥部，是国防部陆军预备干部局，简称预干局，是国民党国防部六厅八局之一。局长蒋经国，副局长贾亦斌。蒋经国十分器重贾亦斌的才华和办事能力，在去上海搞经济管制前，亲自推荐贾亦斌任代局长，并负责动员、召集训练“新军”。在看到嘉兴等地预干总队相继成立时，蒋经国兴高采烈，曾派员到嘉兴祝贺宣慰。但由于国民党蒋介石倒行逆施，已是众叛亲离。贾亦斌长期目睹国民党腐败黑暗，特别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疯狂发动内战，人民涂炭，民怨沸腾，不禁愤慨万千！他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坚决投向革命，反对蒋介石政权，与蒋经国展开尖锐的斗争，毅然在1949年率领嘉兴预干团第一总队举行“四、七”武装起义。预干团第一总队的干部、学员极大多数来自原国民党青年军，当时曾被称为蒋家父子的“子弟兵”、“太子兵”。这支“万人瞩目之‘国立瑰宝’的知识青年军”从蒋家心窝里反出来，确实给蒋家王朝当头一棒！真所谓“江北战场已大败，江南后院又起火”。在“引退”奉化溪口期间，蒋介石为此事多次训斥蒋经国。这次起义虽然在国民党反动集团镇压下失败了，但它却标志着蒋家王朝众叛亲离，人民革命就要在全国取得胜利的新时代的到来，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一、起义的前因和准备

1948年8月，贾亦斌任国民党国防部陆军预备干部局代局长，他从上海到达镇江，与当地一些军政人员密谈。多数人认为国民党已经没有希望，各人要自谋出路，也有的喑然不语，有的则相约再谈。10月20日左右，贾回到南京，自驾吉普车接了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七期同学、中共地下党员段伯宇到中山陵半山腰密谈。问段：“国民党已准备逃之夭夭，你看我们怎么办？”段说：“要自己抓武装才有办法，光依靠杂牌部队，不行。”贾同意他的观点，并初步商讨自行组织武装的计划。此时，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林蔚见济南解放，东北、华北、华东各大战场都很吃紧，预感局势直下，把贾找去，商量要在长江以南组织三十个新军，准备成立二线兵团，兵源尚好征集，唯缺干部，问预备干部局能召集多少干部？贾答：第一期复员青年军，授于预备干部的共有七万六千多人，在嘉兴、杭州、重庆、汉中等地办了四个青年中学，学生近一万人；南京、镇江等地要求就业的预备干部也为数不少。如能把这批预备干部动员召集起来加以训练，至少一万人是不成问题的。贾还自告奋勇，愿负动员、召集和训练之责，但要解决编制和装备才行。林蔚听了很高兴，说“你要什么，尽可能给你满足”，并决定先成立一个总队，以后逐步扩充，学员以准尉待遇，训练时间为三个月，毕业后分配到新军作为排、连长使用。于是预备干部训练总队第一总队初步成立，贾兼任总队长，驻南京孝陵卫原陆军大学校址，开始训练，贾每天亲自带领学员爬登紫金山，练习占领制高点等战术训练。

与此同时，伞兵总队第三团团长刘农峻的部队驻在南京两路口飞机场，担任机场守卫任务。刘农峻与段伯宇贾亦斌都是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七期同学，彼此感情极好。刘亦对国民党极为不满。从此段伯宇常约刘到南京干河沿109号贾家秘密商量。以后参加商谈

策反起义工作的还有宋健人、林勉新等。那时国民党政府准备南迁广州，在一次国防部参谋会议上，参谋次长李及兰提出要把国防部秘密档案，装在两艘大轮船上，沉到长江底，并说“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不能管什么国家民族了”。贾和段等看到这些情况，就计划在南京发动起义。准备贾率领预干总队占领紫金山，刘农峻带领伞兵第三团占领飞机场，趁虚把南京的主要军政人员抓起来，送往解放区去。

1949年1月，贾先后从“总统府”侍从人员中得知：河南省主席张轸于1月1日宣布河南独立；不几天，湖南省主席程潜通电请蒋介石自早引退；1月26日左右，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打了一个电报，要蒋介石在2月1日前辞职，否则他即采取以下三项措施：

- 1.把华中所有军队全部交由李济琛指挥。
- 2.2月1日起，华中地区停止使用金圆券。
- 3.凡从重庆运来的武器弹药，他将在武汉截留。

蒋介石接到这个电报，大为震怒，当场拔出手枪，把送电报的机要人员打死。宋美龄吓得魂不附体，抱着她的洋狗逃到孔祥熙家，对宋蔼龄说：“不好了，老头子发疯了！”

1949年1月28日，蒋介石被迫宣布“引退”，回到奉化溪口，这就是所谓“南京逼宫”。接着，由李宗仁代理总统，贾得知这些消息和情况，更增强了起义的决心和信心。但由于形势发展很快，加之派往河南第二野战军和上海与中共地下党联系的人尚未回来，南京起义的计划未能实现。

蒋介石下野回到溪口后，国民党国防部根据他的指示，把南京的伞兵部队开驻安亭，预备干部第一总队开往嘉兴。1949年2

月在补充了杭州、嘉兴青中和青职学生后，整个预干总队扩充为国防部陆军预备干部训练团，贾亦斌以预干局代局长名义兼预备干部训练团团团长及嘉兴预干团第一总队队长。黎天铎、林勉新为少将副总队长，祁宗汉、文承山、潘震球任上校总队副，秘书长张文藻（中共地下党员、为上海地下党派来工作）。

在预备干部嘉兴第一总队成立的同时，预干局将重庆青年中学三千多人，连同四川要求就业的第一期青年军复员的预备干部，组成预备干部第二总队，由贾委派预干局上校参谋杨锦枫任副总队长，驻重庆复兴关。又以汉中青年中学二千人为基础，组成第三总队，总队长蒋得，驻汉中。

我就是在1949年2月间到嘉兴预干总队任职的。

预干一总队部，设军事教育组、辅导组、总务组（军需、军械）三个组：军事教育组组长李馥斋（预干局上校参谋），下设教育股、参谋股、技术教育股三个股；辅导组组长刘异，下设教育股、康乐股两个股，另配属一支五十余人的宣传队；总务组长周大公，下设军需和军械两室。总队部直辖四个武装大队：一个大队辖四个中队，一个中队辖三个区队，一个区队有三个战斗班，一班编员十六名。一个中队有一百六十人。预备干部一总队有武装学员二千六百余人。连总队部教官、参谋、军需等人员在内共计三千多人。

入伍青年军统称学员，享以准尉待遇，配备有轻、重武器。一个大队中，有二个步兵中队，一个迫击炮中队，一个重机枪中队，均配备有新式步枪、冲锋枪、轻机枪、重机枪、60和82迫击炮、手榴弹及各种子弹充足。一、三大队驻嘉兴西大营，第二、四大队驻东大营。总队部设在西大营：

一大队长李恺寅，下辖：1、2、3、4中队。

二大队长邓道三，下辖：5、6、7、8中队。

三大队长兰弼、副大队长胡岳宣兼十中队长，下辖：9、10、11、12中队。

四大队长李士廉，下辖：13中队，又叫交通中队；14中队，又叫通讯中队；15中队，又叫工兵队；16中队，又叫政工队。

为了起义，物色好队职青年军官是组织的基础，贾亦斌他首先在预干局中挑选思想较进步、富于正义感的军校毕业青年军官任教育组长、大队长、副大队长、中队长，联络员等重要职务如李毅斋、文承山、胡岳宣、陈济光、杨今、彭少怀、李达祥、张维等，他们在以后的起义中起了重要作用。其次在中央训练团中挑选老部下，其中不少是解放军俘虏教育后释放回来的，对于共产党的政策比较了解，而且有亲身体会。国民党对这些人感到头疼。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曾在一次参谋部会议上，主张把这些人全部杀掉，并说：“如不杀掉，将来亡国就亡在这批人身上。”与会人员多数不同意，因为这样做，可能引起这些人的家属和亲友强烈反对，要闹出乱子来。因此，会议决定，把这些人送到中央训练团受训（所谓洗脑）后，令其自谋出路。贾趁机收容了一批，他们后来大都是起义骨干，表现较好。

为了有利于起义的进行，嘉兴预干团第一总队决定不设政工人员，改设辅导员，由学员选举产生。团部并在上海设有办事处（今陕西北路128号），主要用于与中共地下党联系，并筹备各种起义后勤事宜。由李达祥、吴文简、张维等分别负责。

当时在嘉兴预干团第一总队的学员中，文化程度绝大多数是初中以上，也有部分是大学生，大部分是第一期复员的青年军培训为预备干部的，还有一部分是青年军二〇六师的伤病学员。他们的政治思想

情况比较复杂，有的人对国民党还存在幻想，有的人怀疑观望，多数人不满意。那时和战未定，学员中有的人主和，有的人主战，有的人模棱两可。根据中共地下党指示，就让他们组织座谈会进行讨论，争论极为激烈。有一次在操场上召开全体总队辩论会，辩论今后国家怎么办，自己怎么办等等问题，大多数学员主张自力更生，寻找出路。以李德厚为代表的很大一部分学员认为“谁爱国跟谁走”的第三路线。同时还举办了一个《苏报》，开展宣传教育，因势利导，使学员们在思想上得到提高。各中队也在课堂上开展讨论，一时政治空气活跃，军事训练、野外演习、实弹射击都很紧张。

后来，国民党内有人认为贾亦斌对国民党的大局很悲观，却对筹办陆军预备干部训练团如此积极，感到可疑，就派特务携带一大批银元到嘉兴来，住在一家小旅馆里，在干部和学员中调查贾的行动，窃听学员们的各种讨论会和辩论会，秘密向其上级汇报。

3月12日，贾亦斌代局长从溪口回到上海，在华懋饭店楼下餐厅向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李正文、张文藻、段伯宇等人汇报起义准备情况和所遇到问题。经过研究，决定：

1. 将住在上海花园小饭店的贾亦斌的妻子和孩子，送至临平路鸿福里17号楼下一个老百姓家隐蔽，对外扬言说是送往福建去了，以减少国民党对贾的注意。

2. 在预干总队内部进行组织，以读书会、同乡会、研究会等形式，把起义骨干和学员组织起来，并秘密组织“三、三”起义小组，以应万变。

3. 修理无线电台，准备与中共地下党联系。

4. 加速对京、沪国民党部队的三、四个军和几个保安旅进行策反工作，分别派宋健人、李炳林等在其司令部联络。

以上1、2、3项分别布置后，贾亦斌同李正文、段伯宇一起先到上海一个国民党部队进行策反工作，又转南京拟再做另一部队的工作。贾刚刚到家，副官孙效武从上海匆忙赶来，报告说：“国防部已将你原任的三个职务都撤掉，调为国防部部员，派在南京卫戍司令部服务（意思是把贾看管起来），并派黎天铎继任预干团第一总队长”。李、段两人都为贾亦斌担心。贾当即表示：只要我还活着，我是一定能在党的领导下率领这支队伍起义的，请组织上放心。”并告诉孙副官说：“为了防止国民党强加我‘拒不交代’或‘交代不清’等莫须有的罪名把我关押起来，故速办理交代。”接着贾就随同李、段两人从南京赶到上海。贾的撤职命令下达到嘉兴后，预干第一总队官兵大哗，贴出标语：“谁叫我们的贾总队长离开我们？”、“谁剥夺了我们的温暖？”学员们罢课、罢操、要自发上山，闹了好几天，国民党无法收拾，当时离开人民解放军渡江还有些时间，起义时机尚未成熟，中共上海地下党要贾亲自去嘉兴稳定他们，待命再动。根据这一指示，贾到了嘉兴，全总队举行欢迎会，贾对起义骨干做了思想工作，说明现在不能乱动，否则对起义不利。还召集全体学员，为他们上了“论预备干部制度”的“最后一课”。

3月15日，贾从嘉兴回到上海，住在吴官饭店，发现前门已布有特务，就从后门出走，赶赴宝山路段伯宇家研究起义路线。当时原定趁预干总队奉命乘轮开赴福建之际，一出吴淞口，就发动起义，迫使船只向北驶向解放区。后因考虑伞兵第三团即将开赴鼓浪屿，也将采取同样方法起义，如果我们先这样做，必然引起国民党注意，会给伞兵团起义带来极大困难，因此，贾向党组织提出，预干总队在嘉兴起义，伞兵第三团在上海起义（该团根据这个办法，后在连云港起义成功）。

4月2日，李正文向贾传达了中共上海地下党的指示，决定预干总队~~在~~嘉兴起义，经莫干山向天目山挺进，与苏浙皖边区游击队联系，策应人民解放军过长江。预定起义日期为4月15日，起义后可用“苏浙皖边区民主联军”名义活动。

贾接到指示后，极为兴奋，即在当日午夜偕同副官孙效武到上海西站，在混乱中从窗口爬上火车。3日凌晨抵嘉兴，在车站旁一个小旅馆歇了一下，就移居北门外钮家滩一个老百姓家隐蔽起来，每天与总队骨干策划起义，制订行军路线。一面派刘汝苍按照预定起义经过路线去绘制地图，一面派人与中共地下党指定的朱专员联系，又派人到上海催修无线电收发报机，并请张文藻将以上情况向中共上海地下党汇报。

4月4日深夜十二时，贾召集起义骨干三十多人，在嘉兴秀成桥畔的一个糟坊开会。贾讲了这次起义的意义后，有个湖南口音的学员站起来，伪装积极地提出了三个问题：什么时候出发？到什么地方去？与共产党有没有关系？因为这三个问题恰恰是中共地下党指示秘而不宣的问题。经他一问，引起了贾的注意，贾就制止说：“你不要问这些，到时候会告诉你的。”由于当时警惕不够高，没有对他采取措施，以致被他窃取了机密。

二、起义战斗经过

4月6日晨，黎天铎得悉贾到了嘉兴，在晨操时对大队长李恺寅说：“听说贾局长到了嘉兴，你一定晓得。”李答不知道。黎从早上六时直追问到下午四时，采用威胁、利诱各种手段，想从李口中探得贾的住处，并假惺惺地说要去看望贾局长。李一直坚不吐实，并设法摆脱了黎的纠缠。在下午四时半奔到贾住处相告“黎天铎已经发现你到了嘉兴，事已暴露，怎么办？”贾原准备去平望同李焕阁商量起义，今见事已暴露，平望之行决定作罢。他对李恺寅说：“请告诉各大队

立即准备起义，并告黎天铎不要来看我，我去看他。”入夜以后，贾到总队部同黎天铎谈判。贾当时想，如果谈得好，明晨以演习行军名义出发，争取用一天时间安全突过嘉兴、湖州之间一带湖沼地带；谈不好，就把黎天铎杀掉。并立即宣布起义，连夜出发。

天色垂暮，李恺寅派了十几名学员持冲锋枪来投贾亦斌，到了西大营，见操场上这里一堆，那里一群，干部学员们正拿起武器，整装待发。他们纷纷与贾握手，气氛紧张热烈。贾与学员队长一起到黎天铎的办公室和他谈判。学员们同他评理，他不肯行动，直到午夜十二点，仍相持不下。眼看时间不容再拖，贾就明白告诉黎天铎：“我是共产党叫我来的。你现在有两条路：一条是把我送到国防部，可以升官发财；第二条是跟我们走，下令行军，到莫干山演习，限你考虑三分钟答复。”这时，学员中有的把刺刀指向黎的胸膛，有的把手枪对着他的背后。黎见势头不对，吓得魂不附体，嘴唇发抖，对贾说：“你是我的老长官，你带的路不会错，我听你的。”这样，他才拿起笔来，下命令“行军演习二天”。

不久，西大营两个大队很快集合，东大营一个大队也集合好向西大营开来，只有第四大队的13、16两个中队。由于第十三中队长林荫（黎天铎亲戚）乘学员睡熟之际，手持冲锋枪进行弹压，对着睡在地板上的学员们大声叫喊：“谁也不准动，谁敢动就打死谁！”学员们被他惊醒，但都不敢动。只有16中队（政工队）8名学员不顾威胁，跳下楼来参加起义，杨步洲就是其中之一。这时东大营响起了少数枪声和手榴弹声。贾亲自带了两个中队到东大营外面将他们围住，以免林荫带队出来尾随捣乱，并叫黎天铎命令林荫把队伍带出来，但此时林荫已不服从黎天铎指挥。在相持了近三小时后，天已快亮，所有部队必须迅速离开嘉兴。贾亲自带队伍断后。天亮后起义部队离

开嘉兴，下午五时许抵乌镇，在乌镇附近集合。当时学员一夜未睡，白天又强行军，异常疲劳，就征用民船数百只，准备夜间开航，让学员在船上休息。预计翌日天明可以抵莫干山麓，准备同国民党追兵作战。

起义部队刚刚离开嘉兴，林荫就向嘉兴城防司令部报告，并由该部分别急报国民党国防部、京沪杭总司令和浙江省警备总司令部。因此，京沪杭附近的国民党部队和保安团兼程赶到，并包围了乌镇。起义部队刚上船，就闻枪炮齐响，一炮正打在贾乘坐的船边，有些船只被击沉，干部学员死伤不少。起义干部和学员纷纷登岸进行反击，贾带领一、三大队三、四百干部学员向敌人炮兵阵地冲锋。这时，被看押的黎天铎、潘振球等见局面混乱，想趁机逃跑，先大喊“贾局长、贾局长！”贾愤怒地骂道：“喊什么？怕死鬼！”他们就乘贾率领部队向前冲锋无暇顾及及时临阵逃脱。

4月7日夜，起义部队在乌镇三路突围。

第一路，由贾亲自率领三、四百人，经过两昼夜的激战，转移到双林镇。

第二路，由预干团第一总队辅导组组长刘异率领八百余人，10日到达离莫干山十五里的三桥埠。当晚突破敌军防线，冲上莫干山。时大雨滂沱，干部学员衣履尽湿，加以枵腹行军，已一、二日未曾进食，疲惫不堪。武康县县长兼莫干山管理局局长王正道，见起义队伍上山，假装欢迎，招待膳食，安排住宿，稳住起义部队。暗中却派警察下山通报驻军赵荡辉部。午夜，赵部开上莫干山，封锁主要出口，将学员住所层层包围。11日凌晨，迫令缴械。起义部队仓皇中无以应付，有七百余缴了枪，被送回嘉兴。后闻浙江省主席周自齐还亲自接见了这个王正道，嘉奖他“应付有方”。刘异后被押送杭州军法处，

被该处上校处长、青年救国团武装特务杨万昌杀害于钱江大桥下。

第三路，由预干团第一大队长李恺寅带了三百人，冲到德清、武康一带。国民党对起义部队实行所谓“剿抚兼施”。曾派出青年救国团（特务武装），由团长胡轨带领向起义部队喊话：“你们不要受贾亦斌的骗，你们回来，贾亦斌有野心”等等。他们喊，预干总队学员就向他们打枪。他们还是喊：“你们打死我，我还是要喊。”除极少数人被他们骗走外，绝大多数学员边打边退。

4月9日晨，第一、三路起义部队在双林镇附近会合，召开会议，感到敌人四面包围很紧。再加上白天有空军监视和空袭。原来从8日开始，国民党就用飞机侦察，机枪扫射，散传单，从起初的八、九架逐日增加到十二架，自晨迄晚在起义部队头上盘旋。散下的传单上有：

1. 捕送或击毙贾亦斌来归者，重赏。

2. 胁从者无罪，希速归来。

3. 大军已布天罗地网，你们欲逃无路。

4. 为国家、为地方、为你们自己，希速回头。

5. 欢迎被胁从的同学归来。

6. 你们不要被贾亦斌的野心所出卖。

又“悬赏五万银元购缉贾亦斌。”

因此，起义部队必须突过京杭国道进入天目山区，才能与中共游击部队取得联系。但京杭国道上有国民党三十六师利用汽车机动巡逻，严密防堵，我们就利用夜行军，在11日黎明，到达京杭国道边缘。国民党部队料想我们不敢从吴兴县城边通过（吴兴为联防处要点），我们就决定出其不意，把起义部队冒充为三十六师的一个团，由贾亦斌冒充“袁副团长”。

那天凌晨，起义部队开抵吴兴南门外道场山，但浙江省保安团已

先占领对面山头。我们对着他们喊：“我们是三十六师追剿嘉兴叛变部队贾亦斌的。”他们闻喊，信以为真，由保安团总务科长颜修汉率领两名士兵下山来同我们联系。待他们走近，我们命令他“把枪拿下来”，并用手枪指着他，要他把山上的保安团队喊下来，他无可奈何，只得向山上喊：“是自己人，你们下来吧！”我们就迫令他们缴枪，并为我们筹集一些粮食做饭，还搞来大批船只，使我们从吴兴城南平安渡河。

下午四时许，到达妙西山良村。贾亦斌因昼夜行军，趾甲外翻，步履艰难，学员就抬着他走。上山以后，大家都很高兴，李恺寅风趣地说：“请袁副团长（指贾）给我们讲话。”贾才讲了两句：“我们天天想上山打游击，现在我们已到山里了。”话音未落，敌人又围上来了，我们迅速进行反击，敌人多次向我们猛扑，远处一个指挥官骑在马上东奔西跳地在指挥冲锋。贾下令“先把他打死”。有个机枪手学员把马打伤，随即把这个指挥官打死。敌人被迫溃退，伤亡数百人，我方也有近百人伤亡。我们俘获轻、重机枪七、八挺，因携带不便，都把它们沉入塘中。

这时大雨倾盆，追兵越来越多，我们决定突围，找老百姓问是否有路可走，他答，大路已被团团包围，只有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走过的一条路，或许能翻过去。我们请他带路，连夜翻过山去，沿途并散布说：贾亦斌被打死。国民党喜出望外，当天报纸就登载“贾亦斌在良村被击毙。”

干部、学员们因昼夜行军，冒雨作战，衣服湿透，腹中饥饿，队伍越走越少，只剩下八十多人。走到安吉附近，决定再突围。贾和李恺寅在一个老百姓家换了便衣，在前边带路，队伍随后推进。李对贾说：“无论如何要保全你，有你，我们就能和共产党联系。万一把我

捉住，我就承认是贾亦斌，让你找共产党。”又说：“你把手枪给我，走在前边，我保卫你。”俩人刚出村口不到半里路，就遇到了隐蔽在山沟杂树丛中的敌人。贾当时身穿旧布衫。伪装小学教师，说是被起义部队拉来带路的，一个保安中队长说：“你们先等一等，我们县长就在后边。”这些人不认识贾，但县长可能持有通缉贾的照片，会被认出来。他们把贾身上的手表等搜去后，就问：“你们带路的队伍在那里？”贾说：“就在前面，我带你们去找。”那个队长说：“只准去一个，留下一个。”李恺寅以目示意，对贾说：“你带他们走吧，我留在这里。”他们派了一班人押着贾向前走。刚走几步，就听四周枪炮齐响，原来有几部分分头包围我们的敌人，发生了误会，互相开火，贾趁机向自己部队所在的村里跑去。学员见贾奔来，个个迎上敬礼。贾说：“速投入战斗，跟他们打到天黑。”这时，战斗就更加激烈了。

入夜，贾独目一人，走到一家小铺子门外，向一位妇女问路。她默默地指着一条穿过她家屋子出后门的小径，贾就循着羊肠小道往上爬，半夜，雨大苔滑，贾亦斌从十来丈高的山崖上滑下，数小时不省人事，到天破晓时分才苏醒过来。贾一人在深山谷里呆了三天，每天以生竹笋果腹。4月14日以后，枪声沉寂，贾想寻路去游击区。一天早起，发现一座守山人的草蓬子，走近前去，只见壁上悬着一支枪、一面锣，守山人犹熟睡未醒。贾一进去，他醒了，对贾打量一阵，见贾浑身湿透，面有饥色，就问从那儿来。贾告诉他：我是学员，从队伍中失散下来，现在想到游击区去。他听了，表示同情，叫坐下休息，烧饭给贾吃，让贾烤干了衣服，指给一条下山的路。贾辞别山人往山下走去。傍晚到达梅溪，在梅溪小学见到几位教员，并且第一次看到《东南日报》上有关预干总队起义的报导。该校校长杜培积，主

主动给贾五块大洋，请贫农张家漠带路并护送。当时贾艰于步行，这位淳朴善良的农民兄弟便扶着他走。某晚，抵一不知名的小镇，这里是中共游击队、国民党、土匪三不管地带。贾就借宿在一家小客店内，心想，今夜不知会遇到哪一方面的人来。睡到半夜，果然有人来查户口。一问，知道是中共游击队的两位战士，不禁大喜。贾就把情况向他们报告了，两位战士说：“我们已经知道嘉兴顾干总队起义的事。”并给贾一双新布鞋。翌晨，他们让张家漠返回梅溪，并安排用滑竿沿着游击队的交通线，把贾一站一站地送往游击区。先到区委，见到区委负责人；再到县委，见到陈书记；最后到宁国县境的苏浙皖边区所在地，见到工委书记钱敏。一见面，钱就问：“贾亦斌在哪里？”贾说：“我就是。”大家非常高兴，钱说：“敌人打得最凶的时候，我们也曾严加戒备，想接应你们，可惜没有联系上。”他让贾好好休息，找来一位医生给贾看病。时值大军开始渡江，他们俘获了一些美式装备，贾就随他们行动，和他们一起使用这些武器。几天后，钱书记送贾路费、衣服，介绍贾到芜湖再转南京军管会，贾就回南京干河沿家养病。

李正文在我们起义后即撤退至香港，后经天津、北平，再随军南下抵南京。他在香港等地见报载“贾亦斌已在良村被击毙”，觉得死得可惜，应到贾家去看看。一进门，竟发现贾躺在床上休息，相见甚欢。临行，给贾留下渤海币五百元，并叮咛病愈后，当再派车来接。数日后，李派车接贾到丹阳。陈毅司令员和曾山、刘晓等领导同志在丹阳大旅社接见了贾亦斌，鼓励贾努力学习，积极工作，为国家多作贡献。接着贾到第三野战军司令部参加联络工作。1949年5月底，又随军进入上海，与家人见面，并参加上海市公安局工作。当时第一总队一大队长李恺寅和贾分手后被包围的敌人扣留后转辗逃脱，从常

州渡江，到了苏北解放区，向华东局有关部门汇报情况，随同大军渡江，在丹阳与贾相会，后在上海市公安局一起工作。

三、起义火种不灭

4月14日，国民党派国防部预干局副局长徐思贤（军统特务）、国民党国防部副组长、浙江省警备总司令部马科长等到嘉兴处理预干总队起义的“善后”问题。起义部队除一部分在战场上牺牲，一部分在起义途中失散，一部分在杭嘉湖一带参加打游击外，大部分人被俘，押回嘉兴原西大营驻地（约2239人）。徐思贤派欧阳钦任少将总队长（原预干局一处少将副处长），立即将预干团第一总队进行重新编队，总队部仅设一教官室、军需和军械室。不设辅导组，并增设一总部警卫排。委任反动的林荫和反动的教官任大队长，下辖三个大队：

一大队长 陆祥麟 原中校教官 辖2.3.4中队

二大队长 谢子湘 原上校教官 辖5.6.7.8中队

三大队长 林荫 原13中队长，因破坏起义“有功”，连升二级，提为少校大队长，辖9、10、11、12中队，并兼任总部警卫排排长，以监视和控制起义学员的自由行动。

此时，总队部除仓库尚留有大量的步、机子弹和美制铁蛋手榴弹外，已无一枝枪支。在大队中除林荫大队、警卫排共有150支步枪、三挺轻机枪外，其余一、二两个大队均为徒手，整个总队可以说已成无装备的部队。为了想在浙江省保安处取还起义被缴部分武器，也为了伪善“安抚”，总队部将专门押在总部密室的^副原总队副祁宗汉和我（原三大队副大队长）^副释出，祁宗汉名义上仍任总队，但无所事事，我则被委以军械室主任，想利用我与蒋经国关系，命令我去杭州向浙省保安处要回部分武器，而保安处只发还一百多支破烂枪支为搪塞。我到杭州后，趁机将预干一总队准备南逃和要回武器之事向中共地下党汇报，党组织认

为我的身份未暴露（我在1949年底参加三野兵团敌工部工作），命我随队南下伺机发展。

1949年4月24日，欧阳钦率领预干一总队二千多人，在嘉兴上车经杭州向广州方向南逃。我即在当日从杭州登车随队南下，国民党部队逃命争车，混乱异常，火车从杭州开出，经江山、上饶、株洲、曲江到广州，整整走了一个半月，约在5月24日到达广州，当时国防部已移驻广州。预干局对预干总队学员有戒心，怕生事，只准在广州住宿一夜，就催促登轮去厦门。海船走了一星期，到厦门又不给停留休息，转搭小船去漳州（龙溪）。正是农历端午，公历1949年6月初，学员大部分驻龙溪中学。到漳州后，欧阳钦和林荫、谢子湘合谋，开始对学员进行审讯，迫害和镇压。

他们先将队里残留武器枪支、手榴弹等全部收缴，仅给大队部留下三、四枝步枪。另以林荫队为基础，加强警卫排人员，以作镇压进步学员之用。又把总队副祁宗汉骗到反动头子王敬玖、李良荣那里去押起来，至今下落生死不明。造了反动声势后，各中队全面对起义学员进行调查填表、审讯和迫害，并秘密逮捕了从水路来的李德厚等四位进步学员，先扣押在警卫排，后秘密进行活埋杀害。不久秘密败露，激起学员愤怒，我即与“三、三起义秘密小组”骨干讨论，发动对欧阳钦的斗争，约有80%以上学员参加。“不自由毋宁死”、“要自由不怕暗杀”等口号，响彻整个总队。在一次总队大会上学员围住了欧阳钦，后来他从后门逃往反动头子李良荣处哭诉。第三天李良荣带武装部队召开全体官兵大会，公开叫嚣什么“共产党杀我们成千上万，我们杀他几个算什么”，并说：“预干总队定有不良分子，必须彻底改组。”为此，就委李牧良为纵队长，将预干总队改编为“国防部突击第五纵队”。纵队部的人员很少，直属三个大队。其中有二